



堡 垒

湖北省当阳县群益大队党支部工作经验

农村读物出版社



堡垒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局设计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局设计

216
5043

堡 垒

湖北省当阳县群益大队党支部工作經驗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編

农村讀物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这本书，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現在經本社选拔，并作了一些修改。

堡 壘 湖北省当阳县群益大队
党 支 部 工 作 經 驗

中共湖北省委
办 公 厅 編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1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1}{2}$ · 字数 51,000

1965年7月第1版·196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000,001—500,000

統一书号：T3168·28

定价：（二）一角六分

序 言

王任重

一九六二年秋天我下乡的时候到了当阳县，在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任祖雄同志，并且听他介绍了群益生产大队的情况。这第一次见面和第一次谈话，就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群益生产大队党支部的阶级观点很明确，斗争性很强，在他们队里，社会主义的正气压倒了歪风邪气。

同志们一定都还记得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情况。那一段时间正是连续三年的旱灾之后，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利用这些困难，配合国外反动派的反华活动和蒋匪帮窜犯大陆的叫嚣，乘机向我们进攻。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在农村中掀起一股歪风，妄想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我们有一些同志却失去了革命警惕，忘掉了阶级斗争，他们“开会都是同志们，生产只问‘三类苗’”，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十分麻痹，对思想上的“三类苗”不闻不问。这样，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歪风邪气就猖狂起来了。那一次下乡，一路上我们就很听到了一些这方面的反映。

可是，群益生产大队的情况和这些地方就大不相同。在

座談會上，任祖雄同志回答了我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敌人有沒有破坏？有。一露苗頭，就被群眾斗了下去。

干部有沒有蜕化變質的？沒有。黨支部對批評自我批評抓得很緊，一發現問題就教育干部洗手洗澡。

有沒有投機倒把的？個別人搞過一點，被黨支部用來作了反面教材。

有沒有想搞單干的？有那么少數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富裕中農把入社的風斗“借”了回去，不還給隊里。黨支部抓住這件“小事情”，開展了一次兩條道路的教育。

有沒有巫婆，馬脚，風水先生？那沒有。

有沒有入算命問卦？那很少很少。有個算命先生，被婦女們揭穿了他騙人的把戲，以後走過這裡，連叮當也不敢敲了。

有沒有坐花轎的？那沒有。接媳婦，隊里有牲口，有業余樂隊。

有沒有演壞戲、看壞戲的？原來有，現在沒有了。現在隊里的俱樂部演新戲，又好看又受教育。

.....

群益生產大隊頂住了歪風邪氣，頂得堅決，頂得好，叫人听了心情舒暢。群益生產大隊黨支部發揮了戰鬥堡壘的作用，牢牢地守住了黨在农村中的社會主義陣地。

從那時候起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湖北省委、宜昌地委和當陽縣委兩次組織工作組，到群益生產大隊進行了全面的調查總結。從調查總結的材料來看，群益生產大隊黨支部的工作，的確做得很好。“冰凍三尺，非

一日之寒”。群益生产大队之所以能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气概，是他们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

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并且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结束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恰恰相反，农业集体化以后，在农村中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陣，低一陣，有时候比較緩和，有时候十分尖銳。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就说过：“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又说：“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现在，经过合作化以来九年的实践，经过这九年当中农村阶级斗争的几次起伏，我们对毛主席说的话，对农村阶级斗争的问题，应当有更深刻的理解了。我们要想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抓革命，促生产。

群益生产大队党支部的工作做得好，首先也就是因为他

們認真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真正把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明確地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地向幹部和社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不斷地同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歪風邪氣作鬥爭，堅決地沿着農村革命化的道路前進。他們的經驗，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堡壘》這本書，系統地介紹了群益生產大隊黨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我們希望農村中的黨支部在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也來開展一個比學趕幫的運動，努力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黨在农村中的戰鬥堡壘。

（本文作者王任重同志是中共中央中南局
第二書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

統一書號：T3168·28

定 价： 0.16 元

目 录

一	做人的工作起家	1
二	一个好支部书记	9
三	干部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18
四	紧紧地依靠贫农下中农	27
五	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36
六	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	49
七	战斗的作风,正确的方法	55
八	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生活	61
九	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	65
十	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71

一 做人的工作起家

从落后变先进

讀者同志們，在这本书里面要向你們介紹的，是湖北省当阳县共和人民公社群益生产大队党支部的工作經驗。

群益生产大队，是湖北省农业特等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任祖雄同志，是全省农业特等先进生产者。

讀者同志們，可能你們对群益生产大队还不大熟悉。是的，群益生产大队原来并不先进，在湖北也没有什么名声。一九五七年，他們还是一个比較落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就拿生产來說吧。这个地方是以种棉花为主的。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干部和社員还不相信棉花治虫，不会整枝打杈，再加上土质很坏，又没有进行改良土壤的工作，因此，皮棉亩产只有四十多斤。

解放初期，他們水田很少，旱地多是种的杂粮，产量又很低，每年要国家供应几万斤粮食。大搞互助合作以后，他們到七、八里路外开了二百多亩荒田，又合并进来一个水田較多的段家塆，到一九五七年粮食才开始自給有余，但水稻亩产仍不过四百斤。

群益生产大队的工作，从一九五八年才开始轉变。他們被評为全省农业特等先进单位，还是一九六四年三月間湖

北省第三届农业先进单位、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他們是在六年的时间里，由落后轉变成先进的。

在困难中成长

群益生产大队不仅是从落后轉变成先进的，而且是在困难当中成长起来的。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不过六年的时间。而在这六年里，群益生产大队又連續四年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五八年湖北大部分地方的农业生产都是大丰收，群益生产大队却遇到了几十年沒有过的大洪水。群益生产大队地处沮河和漳河的中間。那一年，暴雨成灾，洪水决堤。全队一共三个湾子，冲毁了一个，淹沒了两个。六百多亩棉花一朵未收，旱地的粮食全部被淹。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又連續三年大旱。在旱得最厉害的时候，棉花干卷了叶，水田干裂了口，塘堰干見了底，連社員的生活用水都发生了困难。

群益生产大队遇到的天灾，比全省許多地方要严重得多。可是，他們不仅沒有被困难压倒，而且在同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了起来。

一九五八年大水以后，他們千方百計搶种下去七百多亩粟谷，向老天爷夺回了七万多斤粮食。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他們克服种种困难，搶修了两条支渠，把“五七”长渠的水引到队里来，減輕了旱灾的损失，在一九六一年大旱的情况下仍然增了产。

他們在挖坑窖沙的基础上，种树擋沙，深耕施肥，經過几年的努力，把白沙地改造成了油沙地。

他們平整土地，进行沟壩改革，修路种树，把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田地改成了大块的平整的田地，把弯弯曲曲的羊腸小路改成了又寬又直、楊柳成蔭的大路。

他們虛心学习先进的耕作技术，特别是全面革新了棉花的栽培技术，使棉花的单产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一倍多，水田单产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他們認真貫徹农副业生产全面发展的方針，在抓好棉、粮生产的同时，办起了粉房、軋花、烧窑、运输、养魚、碾米、縫紉、铁工、木工等十七項副业。

一九六三年，全大队棉花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在棉花大幅度增产的同时，粮食总产量也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以上，向国家出售的余粮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农副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值达五百零八元。

生产发展了，对国家的貢獻增加了，公共积累增加了，社員收入也增加了。全大队集体的固定資產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多，平均每戶約有六百八十多元。社員的純收入平均每人达到一百二十七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近几年，全大队共有四十三戶（将近总戶数的三分之一）盖了磚墙瓦屋一百一十一間。

群益生产大队的社員，在党的领导下，用頑强的革命精神和勤勞的双手，終於改变了生产的落后面貌，进入了先进的行列。

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风尚

群益生产大队生产面貌的变化固然令人激动，更使人激动的还是这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

到过群益生产大队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的感觉，就是：这里社会主义的正气压倒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歪风邪气，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风尚。这里的干部和社员，正在生气勃勃地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进。

他们，先国家后集体，先集体后个人。

他们年年都按照国家计划安排生产。在连续四年天灾后的一九六二年，社员生活有些困难，附近有的队缩小棉花播种面积，多种粟谷，而群益生产大队却实播棉花六百三十亩，超过国家分配的计划三十亩。他们说：“我们不能光顾自己，要先看到国家。现在虽然有些困难，精打细算，还可以把生活安排好。能种棉花的地方不种棉花，全国六亿人，还要不要衣服穿？”

他们年年都超额完成国家分配的棉花、粮食、生猪的征购和派购任务。在全省旱灾特别严重的一九六一年，他们主动地不要国家奖给他们的两万斤粮食，把这两万斤粮食支援了口粮比他们低的灾区。同时，在集镇上缺乏蔬菜时，有人粗萝卜菜卖高价，他们还是按照平价卖两分钱一斤。他们说：“不管别人卖什么价钱，我们不能按照高价出售农副产品。”这一年，他们支援市场、支援邻队，平价出售的蔬菜有上十万斤。因此，有人说他们“工作出了队”。

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遵守制度，手脚干净，做活同社员一样，记工同社员一样，奖惩同社员一样，分配

同社員一样，并且处处关心社員的生活。有一次，队里收花生，党支部副书记任盛孝发现他爱人口袋里带回了幾顆花生，当时就进行了批評，并且主动报告生产队长，还在社員大会上檢討自己对家属教育不够。

大多数社員做活不挑不拣，讲究生产质量。做沒有定額的活和做有定額的活一个样，做工分低的活和做工分高的活一个样，沒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他們把最好的肥料交給队里，他們爱惜队里的一草一木。第一生产队有一位老婆婆，住在队里仓库的隔壁。老鼠把仓库里的棉花，拖到她家里的楼板上。她一点一点地把棉花撿起来，交还给队里。

他們，干部关心群众，群众爱护干部。

大多数干部有强烈的階級感情，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的階級兄弟，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們。哪家的房子漏了，哪位老人害了病，哪家小孩要上学，哪个青年恋爱問題处理得不好，哪家两口子吵了嘴……干部都主动上門，帮助解决。社員普遍反映說：“队里的干部替社員想得真周到，我們自己沒想到的他們都想到了。”

大多数社員懂得干部是替群众办事的，都服从干部的領導，关心干部的身体，体貼干部的困难，帮助干部操心。干部害了病，社員提着鸡蛋来看望；干部出門开会，時間长了，社員也惦念他們。在社員当中有不少“管得寬”，当个别社員做了违反集体利益的事情的时候，他們都出来管。

他們，四邻团結友爱，家庭和睦相处。

在社員与社員之間、队与队之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已經成为风气。許多青年分工帮助五保戶挑水砍柴，上山砍柴，先砍完的帮助后砍完的，先挑回的又去接后挑回的。哪家有

人害病，左邻右舍都来看望、帮忙。一九六三年，二队有三户社员遭到火灾，房子家具都烧光了，全队干部和社员自动捐出粮食几百斤，衣服、鞋子、桌椅、板凳、锅碗、脸盆……等许多东西支援他们。有一些社员把自己刚穿过一水的衣服和刚买来的新脸盆也送去了。邻队缺良种，他们支援良种；邻队做活质量不好，他们提出建议；邻队遇到火灾，他们也主动去帮助救灾。

在家庭中，干部家属不要干部操心家务事，鼓励干部好好工作；婆婆帮媳妇看孩子，让媳妇出工、开会、参加学习；父亲帮女儿抄剧本，鼓励女儿参加俱乐部活动……这样的事情很多，不少的家庭已经成为“五好家庭”。

他们，仇恨阶级敌人，反对歪风邪气。

大多数社员只认阶级，不讲宗族。他们严格地监督地主、富农劳动改造，地主、富农有一点不老实，大家就及时揭发，进行斗争。地主分子牛国香，是青年社员宋开丰的亲孀娘。有一次，牛国香偷队里的棉花被宋开丰发觉了，宋开丰马上向干部报告，并且在会上进行了揭发斗争。

群益生产大队家家户户撕下了“天地君亲师之位”，贴上了毛主席像。许多社员起屋上梁不贺喜敬神，把“竖柱巧逢黄道日，上梁恰遇紫微星”的对联，改为“上梁不忘毛主席，竖柱感谢共产党”。逢年过节，没有人抹牌赌博，没有人铺张浪费，没有人看坏戏。队里的俱乐部演革命现代戏，开展正当的文娱活动。好多老人做大寿不摆酒，青年媳妇生小孩不请客。老年人不包办婚姻，青年人响应晚婚的号召。死了人不做斋，不请风水先生，不占好田好地，埋在公共坟地上。迷信活动在这里吃不开，附近的一个算命瞎子走过群益大队，连叮当都不

敢敲。

做人的工作起家

群益生产大队在連續四年天灾的困难条件下，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落后的单位一跃而为全省的一面紅旗呢？这里的干部和社員們說：“这是因为一九五八年整頓了党支部。”附近的一些大队的干部和社員說：“群益生产大队是从做人的工作起家的。”这两句話是最好的回答。

大队党支部是党在农村中的战斗堡垒，是全队的领导核心，是党联系群众的紐帶。群益生产大队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为什么那样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的党支部軟弱无力。

那时候的党支部书记，階級路綫不明确，思想不坚定，受了一些富裕中农的影响，认为当干部划不来，革命意志逐漸衰退，再加上身体也不大好，工作很消极。而一个富裕中农出身的會計，能說会道，能写会算，取得了支部书记的信任，实际上掌握了队里的领导权。

有一次，这个會計和社主任宋太旭到上面参加夏收分配會議回来，在队里的干部会上，宋太旭刚传达完會議精神，他就站起来說：“刚才主任皮毛肤浅地說了几句，我再来給大家讲讲！”根本不把貧农出身的干部放在眼里。

他把會計室布置得很排場，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晚上开会还要弄点吃喝。他穿的好，吃的好，还修房盖屋。可是，年終決算，队里增了产，却没有錢分配。眼看春节要到了，才从邻队借了一千四百元，給社員分了一点过节錢。

社員們把这些事情看在眼里，便都散了心。干部之間也